

主编 顾问
郭金彬 席泽宗
徐梦秋



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性别

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刘兵 章梅芳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重大项目

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对两个研究案例的一种科学编史学探讨

刘 兵 章梅芳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性别视角的科学史研究是国际上近些年来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的新热点,并已扩展、细化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领域。本书以国外有关性别(女性主义)基础理论和对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已有研究为基础,对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史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对于性别研究和科学史研究均有意义,是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

本书可供科学史工作者及其他对科学史、科学文化和性别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刘兵,章梅芳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郭金彬,徐梦秋主编)

ISBN 7-03-015217-4

I. 性… II. ①刘… ②章… III. 技术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N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972 号

责任编辑:孔国平 王剑虹 / 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 蕾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3/4

印数:1—2 500 字数:200 000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总 序

20多年来郭金彬教授在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成绩斐然,他的《中国科学百年风云——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1991年)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1993年)二书相互辉映,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近年来他在厦门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与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徐梦秋教授合作,组织编写《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批书稿即将付印,真是可喜可贺。从已有的书稿内容来看,我觉得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会把中国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郭金彬、孔国平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詹石窗著)、《中国技术思想史论》(王前著)、《中国现代科学思潮》(李醒民著)、《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周昌忠著)、《管子的科技思想》(乐爱国著)、《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技》(刘兵著)……从这些书名和作者就可以窥见这套丛书的阵容和水平了。这批作者都是对他们所写的专题深有钻研的专家,而且题目分布面很广,几乎涵盖了中国科技思想史的方方面面。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我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的报告。这篇报告后来提炼成“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上。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科学思

想史的研究任务可以分为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第一，以自然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为对象，研究每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界有哪些主要的看法（自然观），对科学和技术有哪些主要看法（科学观），这些看法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发展水平有什么关系，与当时的各种哲学学派有什么关系，以及对当时和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起的影响。

第二，以人为对象，研究重要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哲学学派的影响，做出重大贡献时的思想过程和研究方法。

第三，研究自然科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科学上的新飞跃，往往开始于新概念的出现。

第四，研究自然科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包括建立步骤和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今天所达到的水平和面临的问题。

第五，研究建立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时所使用的

的方法。

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根据以上五项任务，把中国的经、史、子、集和各种各样的文献，重新阅读一遍，写出一系列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研究的对象可以是一本本著作（如《管子》的科学思想）、一个个人（如沈括的科学思想）、一个个概念（如“气”）、一个个理论（如道家的养生理论）、一个个学科（如中国数学思想史），也可以断代研究（如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并希望能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一本简明扼要的、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科学思想史》。

从那时以来,这 20 多年间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在国内有很大发展,综合性的著作除郭金彬先生的两本外,据我所知还有:

(1)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1989 年;隋唐至清代,1993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2 卷《科学思想卷》(何兆武等译,1990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

(3) 董英哲:《中国科学思想史》,1990 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4) 李瑶:《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稿》,1995 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朱亚宗:《中国科技批评史》,1995 年,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6) 曾近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1995 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7) 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1998 年;中,2000 年;下,2001 年),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8) 席泽宗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2001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

与此相比,专题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虽然比改革开放以前是大大增加了,但还是显得少了一些,不能尽如人意。这套丛书的出版,则会改变这一局面。20 多年前我的一些设想,将要由厦门大学哲学系和科学出版社变成现实,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故愿为序。

自 1995 年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以来,科学的

内涵已不单指科技成果,如相对论、DNA 双螺旋结构、信息技术等,还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已成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旋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引述孔子的这一句话,生动地描述了时间的连续性、流逝性和流逝的不可逆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在前进,科学总是越来越进步,技术总是越来越高新,方法也会越来越多越巧妙,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科学思想有一定的持续性,思想能够产生思想。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在与今人交流中可以产生思想,在读古书中也可以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成为宝贵的财富。1969 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德尔布吕克(M. Delbrück)就认为他的分子生物学成就与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关;2001 年我国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认为他的数学机械化工作直接得益于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由此可见,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比一般科学史的研究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希望国内有志于此的学者能写出更多好的著作来完善这一文库,也希望广大读者参与批评、讨论,大家共同办好这一园地,使它百花盛开,春光满园。

席泽宗

2004 年 2 月 2 日

目 录

总序

绪论	(1)
----------	-------

第一章 对费侠莉的女性主义中国古代医学史案例的研究

.....	(8)
-------	-------

第一节 费侠莉及其相关研究缘起	(8)
-----------------------	-------

第二节 《繁盛的阴》的研究思路	(11)
-----------------------	--------

第三节 《繁盛的阴》的研究内容	(21)
-----------------------	--------

第四节 对费侠莉研究的价值与问题的分析	(57)
---------------------------	--------

第二章 对白馥兰的女性主义中国古代技术史案例研究 ... (62)

第一节 白馥兰及其学术关注点	(62)
----------------------	--------

第二节 《技术与性别》的研究视角	(63)
------------------------	--------

第三节 《技术与性别》的研究内容	(71)
------------------------	--------

第四节 对白馥兰工作的价值与问题的分析	(147)
---------------------------	---------

第三章 分析与总结

第一节 女性主义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一些特点	(153)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意义	(156)
--------------------------	---------

第三节 兴起本土化探索	(165)
-------------------	---------

第四章 其他女性主义相关研究提要

第一节 其他女性主义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168)
---------------------------	---------

第二节 对其他地区的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	(173)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中国妇女史研究	(175)
-----------------------	---------

附录

附录一:关于女性主义与科学的演讲	(178)
------------------------	---------

附录二:关于女性与女性主义的漫谈	(197)
------------------------	---------

附录三: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若干特色	
-----------------------	--

——以席瓦为例	(218)
---------------	---------

附录四:物理学与性别	(225)
------------------	---------

后记	(236)
----------	---------

绪 论

本书是一本科学编史学研究的著作。

最为通俗地讲,可以大致这样来理解科学、科学史和科学编史学的差别: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研究者是科学家;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和科学家,研究者是科学史家;而科学编史学,则将研究的对象设定为科学史和科学史家,研究者是科学编史学工作者(这里姑且没有用“家”一词,在中文的语境中算是一种中性的姿态或者谦逊吧)。因此,可以说科学编史学是对科学史的一种“元”研究。

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曾说过,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①在此意义上,科学编史学研究就与之相关了,它所要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科学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如研究科学史建制化和编史纲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等,而这与科学哲学的立场也是密切相关的。站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理解科学史当下的思潮与走向,这些工作对于促进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科学史成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因其早期的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两大编史传统。前者的兴趣焦点和价值取向从属于其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需要;后者则把哲学倾向引入科学史,希望科学史能支持他们的哲学。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些研究者基本上还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他们分别编写出专科史和综合史

^①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7。

以作为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在此,编史本身不是目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尚未形成。^①

但即使在此阶段,也可看出哲学思潮(主要是实证主义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方法和编史原则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和总结的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形成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它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是运用某种最近被确定为正确的科学方法,对过去的真理和谬误所作的不断检阅,是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过程。直到萨顿的科学编史学传统,无论是科学家的专科史,还是哲学倾向的综合通史,都没有脱离这种编年史的方法。^② 这种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年史方法虽然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也曾作为科学史发展中一个阶段的主导,但由于它不能对历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不能更加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与境(context)中去,不能为材料的搜集和选择提供更有力的理性依据,所以它还是随着现代科学编史纲领的出现而逐渐衰落了。

20世纪30年代,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概念演化史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开始在科学史领域产生影响。亚历山大·柯瓦雷通过对伽利略和牛顿的研究,开创了“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在这种编史纲领里,科学被看成是对真理的理论探索,科学的进步体现在概念的进化上,科学发展有着内在自主的逻辑。它强调科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列举伟大发明和发现的清单,而是要对历史进行解释;不仅要科学史上的精英和进步贡献做研究,也要对次要人物和历史错误进行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其对今天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弄清文献作者当时的想法。这一套由柯瓦雷开创的编史学纲领及其概念分析方法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史

① 吴国盛,科学思想史指南,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编者前言,5~6。

② 吴国盛,科学思想史指南,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编者前言,7。

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下,与实证主义科学史和观念论科学史相对的另一种编史纲领逐渐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①在肖莱马、格森、默顿、克拉克、齐塞尔等人的推动下,这一编史传统不断发展成熟,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开始对传统的内史研究形成真正的挑战,至今在整个科学史界仍有重大影响。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每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里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产生的科学观、科学史观和编史传统直接形成了科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和新方法,科学史学科本身也因此而得到了重大发展。相比之下,目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虽然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但就主体来说,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主要限于考据和分析历史文献。毋庸置疑,实证主义传统确实给中国科学史研究带来了大量成果,它今后仍将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若仅局限于这种纲领,则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必然受限,科学史研究终将失去发展的活力。所以,要保持发展潜力,我们就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方法、新思潮。

随着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逐渐兴起与发展,它对科学史的研究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影响,为科学史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活力,提供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新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当然,也提供了它所独有的价值倾向。虽然现在对此新的发展倾向仍有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但即使与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史家也会发现,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存在和影响无法忽视。因而,科

^①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24。

学编史学的研究自然也必然要将视线投向这个迅速发展壮大的科学史领域。

女性主义(或称女权主义,这个称呼更适用于其早期形态)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① 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按其发展脉络或者理论基础的类别,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若干不同的流派。^② 这些流派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存在激烈的内部冲突,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几乎都在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或者有时也可简称为“性别”。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按照社会要求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且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提出这一重要概念的意义在于,既然性别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多重途径来改变这种建构,从而使实现两性平等成为可能。这一概念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基本分析范畴,在史学、科学批判等领域中已被广泛运用,当把它应用于以往没有性别视角的各种研究领域时,女性主义研究者取得了很多的新成果。

在一开始,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如妇女健康运动、反核和平运动等)。这样一些运动使得人们对以往所设定的科学的本质产生了疑问,人们开始思考,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科学能否被看成是父权制行为表现极为明显的领

①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88~89。

②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域?近代科学是否应被看成是父权制的重要方面?延伸到科学史研究,人们开始询问,科学在历史上为何成为男性主导的领域?女性科学活动如何被科学史学家忽略或边缘化?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就是要回答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它揭示科学的男性主导性及其客观价值以及工具理性等将女性排斥在外的过程。

粗略地讲,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的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认为科学史可以通过追认女性的成就而得到完善。这种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在于,没有能够解释男性主导科学的根源,默认了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屈从地位,本质上是按潜在的“男性标准”进行的“补偿式”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一直处在这个阶段。第二阶段的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引入批判性的分析维度,寻找并批判科学的“父权制”根源,这一点决定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位置。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伊芙琳·福克斯·凯勒、桑德拉·哈丁等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①还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从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方面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父权制互相强化的本质。对此,唐娜·哈拉威认为,批判性女性主义的科学编史学不必将其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②近几年来,西方女性主义也开始日益关注女性身份的差异性问题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在以社会性别为主要分析范畴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将女性主体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目前,女性主义科学编史思想已经

①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Evelyn Fox Keller,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Donna Jeanne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构成了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

不过,在第二个阶段的前期,正如其他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一样,学者们所关注的,或者说是作为其潜在理论基础的,是以中产阶级白种妇女的经验为核心的女性主义意识。在这种变化中,原来居于边缘地位的中产阶级白种女性的观念和问题被逐渐中心化,但除中产阶级白种女性以外的其他女性却依然处于边缘地位。因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开始出现对不同文化中女性身份多样性与差异性问题的认识,这使得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妇女的处境和地位。相应地,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也经历了从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到寻找并批判科学的“父权制”根源的发展过程,开始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一些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史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文化特殊性和具体的历史情境。

不过,由于它毕竟还只是在发展中,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所以在对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史研究里,在性别视角下进行的有关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还不多见,但令人欣慰的是,毕竟还是有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开创性工作。在这些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工作有国外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和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关于中国古代技术与性别以及妇科史的相关研究。其中,费侠莉的工作曾获得了2001年的妇女科学史奖。目前,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在西方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大大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领域,发现并揭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现象。同时已有研究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中国古代,但类似于白馥兰与费侠莉的研究,在国内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将这些国外学者所做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与国内学者所做的传统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做深入的比较分析,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因此,本书将以白馥兰和费侠莉两人的相关研究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以这种案例式的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

探讨了女性主义科学史,特别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对非主流科学的研究中若干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影响,并尝试尽可能地将视野最大限度地扩大,将分析进一步地延伸。

最后需要再简单地补充说明的是,初看上去,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似乎是以女性或者与女性相关的主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但实际上,更确切地或更准确地说,它的研究主题并不一定非要仅仅限于女性,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在性别视角下,科学史会呈现出与传统理解相当不同的面貌。

当然,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标题中的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很明显地是将医学(甚至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包括了进来。其实,在笔者的观念中,与那种有着相对严格的界定的现代科学有所不同的古代科学、非主流科学等,都在一种多元科学文化的意义上对科学史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否则,科学史的研究就会因其对象的“非科学”而丧失合法性。不过,有关这种科学概念的泛化及其在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在这篇绪论中就先不展开讨论了。

鉴于国内科学史界对于女性主义的科学及历史研究还不够熟悉,因此,本书在最后部分收录了作者几篇相关的文章,以期作为一种对女性主义研究的背景介绍。

第一章 对费侠莉的女性主义中国古代医学史案例的研究

第一节 费侠莉及其相关研究缘起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目前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她所担任的专业职务和所撰写的专业著作、论文以及获得的奖项和荣誉的事迹清单都很长,但其核心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在中国史的范围内,她的研究又相当广泛,遍及上古历史至近代史、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她曾是《剑桥晚清史》的撰写人之一,最近几年她的研究主题转为近代中国的医学史与身体性别史,焦点放在宋代至明代这几百年来医学史和身体性别史的演变与发展上。费侠莉现已年届 70,她数十年来都致力于推动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

幸运的是,前不久费侠莉受其好友,斯坦福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的邀请来到上海,并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题为“女性主义视野下明清时期的性别、医疗与身体”的演讲。虽然笔者未能参加这次报告,但东方早报记者就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及女性主义学术的话题专访了费侠莉教授。^①这份采访对于了解费侠莉的学术发展轨迹以及费侠莉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都十分重要。

首先,费侠莉介绍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的变化过程。费侠莉谈到,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激进运动

^① 阳敏、费侠莉,身体是被建构出来的。http://www.whb.com.cn/jy/t20041222_333087.htm

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也逐渐地改变了美国的汉学研究,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开始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史产生兴趣。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的丧失,带有浪漫色彩且热门的“妇女史”逐渐褪去光环,“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进一步感到失望,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开始担忧自己是否已经误入歧途。许多人断定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是肤浅的,首先是因为他们太沉迷于“西方的影响”;其次,他们太易于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表面价值。这时,基于更长远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开始兴起,它不但打破了“传统—现代”的两分法,也更容许一个另类的中国历史叙述浮出水面。

而女性主义学者所走的这一条道路是从革命的妇女史转向19世纪前的妇女社会史,然后再慢慢地从单纯关注女性的妇女史转向更注重细微差别和男女互动关系的性别史,最后,他们还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根据语言和话语进行文本分析的文化研究的影响。

其次,费侠莉对其本人研究所经历的类似变化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1960年,美国学术界普遍用冷战思维来研究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奖学金来激励年轻学者研究亚洲,这可以帮助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依据“二战”之后美国的全球角色定位来进一步了解亚洲。费侠莉的论文也带着这样的色彩,她研究了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并试图通过对丁文江生平的研究去研究“五四运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侠莉通过对医药典籍的研究进入了社会史的研究阶段。当时,她有两篇论文是通过研读大量民间家训以及妇女生育指南写成的,论文分析了中国的儒家道德的传播、家族内部关系和妇女地位等问题,并特别梳理了“身体”这一概念在中国文本中形成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侠莉开始受到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她指出,历史学从不将人的身体列入研究范围,如月经,但是人类学却把它视为严肃的课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与此同时,人类学又有着不讲究历史渊源的局限性,因此费侠莉尝试着把人类